



忠烈英魂

革命战争年代的30位
党员先锋

编著 ◎ 马 轲



感动共和国的党员先锋丛书

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花山文艺出版社

★感动共和国的党员先锋丛书

忠烈英魂

革命战争年代的 30 位

党员先锋

编著◎马 轲



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公司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忠烈英魂:革命战争年代的30位党员先锋/马轲编著.

-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1

(感动共和国的党员先锋丛书)

ISBN 978-7-5511-0184-4

I. 忠… II. 马… III. 中国共产党—模范共产党员—先进事迹 IV. D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1639 号

丛 书 名: 感动共和国的党员先锋丛书

书 名: 忠烈英魂

——革命战争年代的30位党员先锋

编 著: 马 轲

总 策 划: 温廷华 张采鑫

责任编辑: 卢水淹

特约编辑: 李文生

责任校对: 齐 欣

全案设计: 北京九洲鼎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6 / 32 / 35 / 43

传 真: 0311-88643234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0184-4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辑 志士头颅为党落

- | | |
|----------------|-----|
| 党的创始人——李大钊 | 002 |
| 誓与黄埔共始终——熊雄 | 009 |
| 党的早期政治活动家——陈延年 | 014 |
|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 | 021 |
| 广州起义领导人——张太雷 | 027 |
| “志士头颅为党落”——周文雍 | 034 |

第二辑 热血谱写就义诗

- | | |
|---------------|-----|
| 妇女运动的先驱——向警予 | 040 |
| 热血谱写就义诗——夏明翰 | 047 |
| 农民运动先驱者——彭湃 | 052 |
| 毛泽东的“骄杨”——杨开慧 | 059 |
| 青年运动先驱——恽代英 | 066 |
| 红军虎将——黄公略 | 073 |

第三辑 忠于人民的英雄

- | | |
|----------------|-----|
| 壮族人民优秀的儿子——韦拔群 | 082 |
| 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邓中夏 | 090 |
| 抗日名将——吉鸿昌 | 097 |
| 党的情报工作英杰——钱壮飞 | 105 |
| 赣东北苏区创建人——方志敏 | 110 |
| “人民的英雄”——刘志丹 | 117 |

第四辑 英名与天地共长存

- | | |
|----------------|-----|
| 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 124 |
| 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杨靖宇 | 130 |
| 以身殉国的抗日名将——左权 | 138 |
| 英名与天山共存——陈潭秋 | 145 |
| 红色理财家——毛泽民 | 151 |
| 新四军战将——彭雪枫 | 157 |

第五辑 千锤百炼成英骨

- | | |
|------------------|-----|
| 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张思德 | 164 |
| 千锤百炼的政治家——王若飞 | 169 |
| 人民军队的创建者之一——叶挺 | 174 |
|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胡兰 | 181 |
| 舍身炸碉堡的英雄战士——董存瑞 | 187 |
| 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江竹筠 | 195 |

第一辑

志士头颅为党落



李大钊



孙 君



陈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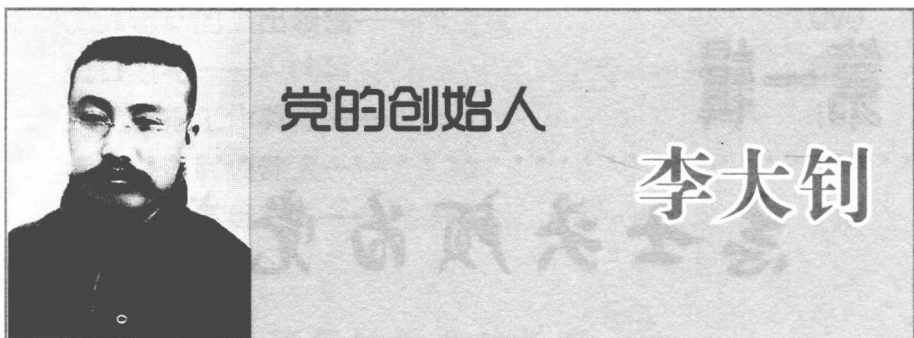
卢德铭



张太雷



周文雍



李大钊（1889～1927），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时期青年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重要领导者。38岁时被反动军阀杀害。他作为共产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为革命贡献了一切，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大量诗文遗著，成为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1月29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遗腹子，未见过父亲，出生不久母亲也去世了，靠70多岁的祖父抚养。祖父考取过秀才，得过“从九品”官衔，还开过杂货铺，所以家境比较富裕。他7岁入私塾读书，15岁考入河北卢龙县永平府中学。在他11岁时，根据当地风俗，与本村姑娘赵纫兰结婚。妻子比他大7岁，在他出外读书和工作期间，独自操持家务，先后生育、抚养6个子女。

1907年7月，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法政课程及英语、日语。在校期间，参加过罢课请求政府开设国会的运动，参加了北洋法政学会，担任学会刊物《言治》编辑，并发表过政论文章。毕业后在众议院议员汤化龙的资助下，于1913年冬东渡日本留学。到日本不久，因投稿《甲寅》，得到该刊主编章士钊的器重，认为李的文章“温文醇懿，神似欧公”，二人遂结为好友。通

过章士钊,李大钊又结识了后来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及高一涵等。

1914年秋,李大钊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学科。在这里,他学习了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以及经济、史学、法律等课程,并接触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知名社会学家安部矶雄,受到安部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十分留意国内政治形势,参加过留学生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担任留日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编辑《国耻纪念录》、《民彝》杂志,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民彝与政治》等政论文章。同时,还从事外国学者著作的翻译工作。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到上海,参加了宪法研究会的活动,并任汤化龙的秘书。后应汤化龙邀请,到北京主编《晨钟报》。不久辞职,参加《宪法公言》、《言治季刊》、《甲寅日刊》的创办和编辑工作。1918年1月,经章士钊介绍,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在近5年的时间里,他对图书馆进行了整顿、扩充和改革并组织了图书馆讲习班,对图书馆的教育、管理及美国图书馆概况做过研究,参与发起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同时,他还参与了大量社会活动。他加入北京大学进德会,为纠察员;参与发起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学余俱乐部、教职员会、新知书社、赈灾社及太平洋问题研究会、非宗教大同盟等。他还参与发起少年中国学会,作为骨干成员,先后任《少年中国》月刊编辑部主任、发稿人、编译员等;担任北京大学学生团体国民社的导师和新潮社的顾问;指导过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团体觉悟社;参与发起北京工读互助团。他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及邓中夏、周恩来、高君宇等不少人都程度不同地受过李大钊的影响。后来,李大钊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相继在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授课。同时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讲授现代政治、社会主义运动、唯物史观、社会立法、女权运动等课程,并经常应邀做学术或社会问题演讲报告,总是受到热烈欢迎。

(二)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最早参与者和主将。早在《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创刊之初,就同创办人陈独秀站在一起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展开猛烈进攻。在1916年9月发表的那篇气势磅礴的论

文《青春》中，李大钊用满腔的热情，激励青年们自觉奋起，“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囿”；“前进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此后，李大钊大量著文，介绍托尔斯泰、尼采、培根、泰戈尔、罗丹等外国学者、作家的观点，宣传思想自由、文化进步、社会改革，批判主张将孔子学说载入宪法的复古思潮，阐述民主政治原理，抨击专制势力。他与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胡适、高一涵、周作人等共同组成了传播新思想、开辟新启蒙运动的新文化阵营。

(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中外反动势力把新生的苏俄和马克思主义诬为“过激党”、“洪水猛兽”。李大钊却勇敢地站在苏俄和社会主义一边，在中国最早放声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最早理解了十月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介绍到中国来。早在1918年下半年，他就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颂扬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18世纪的法兰西革命，它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体现了“20世纪全人类人人共同觉悟的精神”。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将来的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5月，李大钊将其负责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后又写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历史、政治、社会问题。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对毛泽东、邓中夏等革命青年影响尤深。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当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

(四)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人之一。他指导团体的骨干分子确定斗争的目标和方式方法，他的办公室成为活动分子集会的中心。5月4日当天，参加游行的学生有32人被捕。他和蔡元培校长等一起，积极营救被捕学生。反动的北洋政府企图改组北京大学，逼迫蔡元培辞职。北大教职员发起挽留蔡校长运动，李大钊是被推举赴教育部交涉的8名代表之一。为扩大五四游行的影响，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接连三期出版《山东问题》专号，详细报道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巴黎和会上我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为人们进一步指明了斗争的远大目标。他说：“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他又发表《太上政府》、《新华门前的血泪》等短论，抨击干涉中国政治的外国领事馆，对罢课请愿的学生表示同情和支持。

在革命运动的强大压力下，反动政府被迫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我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也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当运动告一段落时，李大钊7月13日在《每周评论》上教育青年不要松劲，不要对反动派产生幻想，要坚持斗争，获得真正的解放。他指出：“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监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

(五)

1920年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一路上，二人交换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两人商定，李大钊在北京主盟联络同仁筹建组织，兼与苏联方面磋商；陈独秀到上海后，即向广州及整个南方辐射建党事宜。从此，南陈北李共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格局逐步形成。

李大钊回京后，便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经与邓中夏、高君宇等协商，决定首先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为建党做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有邓中夏、高君宇、朱务善等19位北大学生、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参加。

同年3月,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李大钊在北京会见了,共同探讨了有关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接着,李大钊又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会见。陈独秀遂于同年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史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9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包括张申府、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高君宇、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召开,李大钊被推举为负责人,开始称“联络”,后改称“书记”。为了解决小组的活动经费,李大钊从工资中每月捐出80元钱。同时,在李大钊的指导下,还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等几十人参加,推举高君宇为书记。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影响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立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在李大钊的直接帮助下,张太雷还在天津发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于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六)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李大钊随即赴上海、杭州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在此期间,李大钊会晤孙中山,与孙一起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不久,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另几位中央主要领导人,经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改组成员。

1924年1月,李大钊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出版及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并被大会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李大钊严正驳斥了有人提出的不许党员“跨党”的提案,指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大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总统曹锟,电邀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于年底抵达北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了欢迎孙中山北上和促成国民会议召开的活动。李大钊多次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后援会、招待会,发表演讲,并被聘为国民会

议促成会运动委员会委员长。1925年1月,孙中山病重入院,李大钊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孙中山逝世不久,北京有反对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同志俱乐部成立,后又出现了分裂国民党的“西山会议派”。李大钊与国民党左派一起,与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李大钊参与了争取冯玉祥与国民党合作的活动,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促使冯玉祥配合国民革命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参加北伐。

1926年3月,发生了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日、英、美、法、意等8国公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3月18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200余团体在天安门召开一致反对8国通牒的国民大会。李大钊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发表了演说。会后,群众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请愿。一路高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等口号。李大钊亲自打起一面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到门口,李大钊等提出要见执政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府院卫队不许进门,并用刀刺伤多人。接着,段祺瑞下令调来更多军警,对群众进行野蛮镇压,当场打死40多人,伤150多人。李大钊的脸和手也受了伤,但他却从容镇定地指挥和掩护群众撤退。他最后从东口退出,当晚召开了党、团组织联席会议,部署了慰问伤员、为死难者开追悼会和进一步揭露北洋政府专制媚外的反动本质,继续坚持斗争的问题。

第二天,段祺瑞执政政府下令通缉李大钊等人。李大钊遂携妻子、儿女随同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旧兵营内居住。

(七)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300多人包围了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60余人,随即进行了审问。

李大钊被捕的第三天,北平《晨报》报道了他在敌人法庭上的态度。写道:“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没谈党之工作,否认最近对北方有密谋。李被捕时,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

同一天的《世界日报》报道说:“李被捕时……满脸髭须。但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云云。”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现其所信，厉行其所知，立功为罪，所不暇计。”他在供词中大讲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改造国家，以求民族的独立与自主，曾与孙中山先生交往，参与国民党活动，并且声明一切由他负责，希望不要株连其他爱国青年。对于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他只字不提。他的身体因备受酷刑而遭到严重摧残，但敌人的审讯丝毫没有能够让他屈服。

他被捕后，北京20所大学联合发起过营救活动，均未奏效，因为他的崇高威望更加使得反动军阀又恨又怕，必欲置之死地。当李大钊闻听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来营救他时，他坚决拒绝了。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牺牲，是光荣而应当的，但已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作冒险事业，耗费革命力量……现在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再受损失！”

当时报纸上还报道，他“在监狱中二十余日，绝口不谈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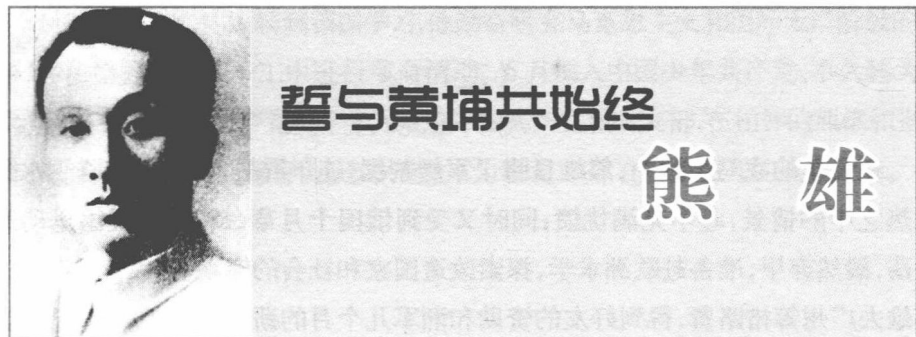
4月28日，在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北伐中途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在华公使团三方的阴谋勾结下，对他们共同的对手人李大钊判处“绞刑”。审判是秘密进行的。上午10时在京师警察所开庭审判，当天下午就在西交民巷地方看守所后院，用从西方进口的、中国从来没有的绞刑架杀害了李大钊和其他19位国共两党的青年战友。

李大钊是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面对反动军警，他作了最后一次简短的演讲。他高声说道：“不能因为你们杀死了我，就杀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荣的胜利！”最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李大钊就义后，北京各报一致哀悼，全国为之震惊。

北大教授刘半农受同仁委托，也曾撰写过一篇碑文：

君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会张作霖自称大元帅于北京，政从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游六十余众，而令何丰林按其狱。君与路友于、张伯华、邓文辉等二十人罹于难。风凄雨横，摧此英贤，呜呼伤哉！



熊雄（1892～1927），江西宜丰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法国勤工俭学，建党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莫斯科学习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国共合作时期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中共在军校的主要负责人，为培养军政干部、支援北伐战争、巩固广东后方作出了重要贡献。1927年在广州反革命政变中遭到逮捕，被秘密杀害。

（一）

熊雄，原名祖福，号中和，字罍（pí）士，1892年4月8日出生在江西省宜丰县芳溪下屋村一个富裕的家庭。熊雄秉性忠厚，老成持重，勤于学习，古文和武术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07年初，他考取瑞州府中学堂，因勤奋好学，以最优等的成绩毕业。1911年初，清王朝被推翻的前夜，熊雄在南昌考取江西新军的学生军。武昌首义后，新军与陆军小学、武备学堂、测绘学堂中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也宣布起义，占领了南昌城。

辛亥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发动了二次革命。李烈钧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在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熊雄所在学兵团驻守在湖口石钟山前沿阵地，参加战斗。起义持续一个多月就失败了，熊雄被迫随李烈钧逃往日本。在东京，他得识孙中山先生，并于次年加入孙中山在日本重组的中华革

命党，进入该党设在东京的军事学校学习。

1916年熊雄回国后，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运动，先在李烈钧的护国滇军中工作，后在程潜的护国湘军中任总司令部上校参谋，成为一名奋发有为的年轻军官。

(二)

在长年的戎马生涯中，熊雄目睹了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国家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情景，心中充满忧愤；同时又受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激荡，毅然弃甲，准备赴欧洲求学，探索改造国家和社会的道路。1919年10月，熊雄去广州筹措路费，得到好友的资助和湘军几个月的薪饷，于11月取道香港，搭上了法国邮轮。

年底，熊雄到达巴黎，由华法教育会安排在郊区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语。他完全放弃了过去优裕的生活条件，与勤工俭学的同学过着一样艰苦的工读生活。课余寝前，他常与同学聚集一处，切磋学业。由于他刻苦学习，勤记多问，克服了年龄较大、学外语难的困扰，较快地学会了法语。

熊雄非常喜欢阅读国内出版的《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十分关注国内和苏俄十月革命后的革命形势。初到法国时，他看不懂法文书刊，又没有条件订购国内书刊，为此，倡议勤工俭学同学交换阅读国内书刊，并采用通函的方式轮流交换。他与同校的熊自难、秦青川、萧金芳等人组织了巴黎书报流通社，在交换新书刊的同时，还讨论了文字改革和革命道路等问题，增进了同学间的交往和了解。与此同时，熊雄总是积极参加华法教育会和华侨协社所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先后认识了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李立三等人，他们志同道合，交往很深。

1920年暑期，熊雄离开圣日耳曼中学，迁居巴黎拉丁区的文教中心，一面选择学校，一面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结识了许多勤工俭学同学和华工。秋天，他陪同来自英美的友人游埃菲尔铁塔，作了这样一首七绝：

登高东望一咨嗟，
长剑倚天信手拿。
北海鲸鲵终就戮，
南圻逐鹿竟谁家？

此诗大气磅礴，慷慨激昂，表达了拯救国家和民众的远大志向和坚定决心。

同年底，熊雄和赵世炎、李立三、陈公培、熊自难等十余人在巴黎组织了劳动学会，明确提出要革命，要到工厂做工、了解工人，把华工组织起来。后来，他们又以劳动学会等组织为基础，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

1922年3月，熊雄转到德国学习，他勤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并在旅德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6月加入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转为中共党员。8月，旅欧共产党员十多人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柏林的熊雄和张申府、刘清扬、王圭、熊锐等开会，选举周恩来为代表，出席在巴黎召开的成立大会。

(三)

为了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根据国内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开始有计划地选送党团员赴苏联学习。1923年3月，熊雄与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2人第一批去莫斯科，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

在东大期间，熊雄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一有空便专心致志地读书，甚至有的同学与他谈话，他还是一边读书一边回答。他的勤奋好学、亲切热情，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暑期，大家在莫斯科郊外度假，得知孙逸仙代表团来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及党务。中共旅莫支部参加接待，并指定熊雄参加陪同参观，洽谈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熊雄因而得与担任代表团团长的蒋介石相识。

中共旅莫支部为了培养党在各条战线从事革命运动的骨干，根据每个同学的专长和特点，先后将他们派往苏联有关部门进行短期的专门教育和训练。熊雄被派到苏联红军中学习部队的政治工作，并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军事训练。

(四)

1925年9月，熊雄奉调回国，到上海报到。中共中央派他到广州革命根据地工作，被分配到黄埔军校任职。10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二次东征，熊雄任东征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协助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以黄埔军校师生为主体的革命军击溃了陈炯明叛军，收复了东江，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1926年1月6日,熊雄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由军校秘书长邵力子兼),主持政治部工作,同时参加了中共广东区委军委,是中国共产党在军校的主要负责人。3月,他又兼任了潮州分校的政治部主任。

这时,军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军事政治学校,熊雄是改组筹备委员七人之一。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于3月1日开学。第四期学生2300多人,除编步、炮、工等科外,还增设了政治科。

1926年4月,军校开始筹备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别党部,以方鼎英、张治中、熊雄等五人为筹备员。5月正式成立,熊雄当选为监察委员。后来改选时,有声望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和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都当选了,熊雄继续当选为监察委员,使军校特别党部仍然保持了左派的绝对优势,为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发展国民革命运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山舰事件中,军校受到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调来的军队的严密监视和控制。在突然事变面前,熊雄命令政治部全体人员保持常态,静候党的指示,使这一事态较少波及政治部。

1926年5月,蒋介石抛出“整理党务案”。后又到军校发表反共讲话,要军校师生填表声明党籍,不准“跨党”,而且还以高官厚禄拉拢、收买共产党人。但是,军校中的共产党员都没有表态。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借机加强了对后方和军校的控制。他对校部各负责人作了讲话,并写了“几个口号”(“禁绝小组织——小团体”等),当面交给熊雄,含沙射影地攻击共产党人。他还利用所控制的“黄埔同学会”进行破坏活动,监视校中共产党人。熊雄立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于8月3日在《黄埔日报》上发表了《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提出要“团结革命分子,集中革命势力”,坚持孙中山“主张容纳各派革命分子”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文章指出,所谓小组织——小团体是私人组织,“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而共产党“既是代表工农的政党,自有其独立性”。应该“各认清合作的原则”,“对于破坏党的组织的人,就应作我们的公敌,即拿起对付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精神,与之奋斗。”

1927年1月,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武汉,熊雄、孙炳文、萧楚女等留在后方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熊雄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随着北伐的发展和工农运动的高涨,国民党右派和校内反动势力的破坏活动日益疯狂。熊雄坚守岗位,一面组织左派力量揭露和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一面秘密组织党团员转移,做好应变的准备。